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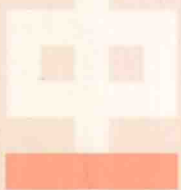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

从人口红利到 改革红利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 DIVIDEND



蔡 昉 著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主题出版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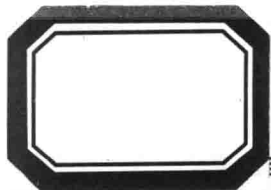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 ·

从人口红利到 改革红利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 DIVIDEND

蔡 昉 著



目 (CIP) 数据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蔡昉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4. 6

(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

ISBN 978-7-5097-6012-3

I. ①从… II. ①蔡…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 ②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9245 号

· 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 ·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著 者 / 蔡 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任文武

责任校对 / 杜绪林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012-3

定 价 / 48.00 元

印 张 / 17

字 数 / 239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

版权所有 翻印

联系更换

总 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这一系列重要讲话是对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深化和拓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全面阐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重大原则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指导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系列讲话，要求我们不仅方向明确，也要路径清晰，不仅要快速推进，更要注重成效，蹄疾而步稳。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依然存在改什么、怎么改以及孰先孰后的问题；具体到改革的各个领域、层次、板块，具体到改革的策略与方法，依然存在争议、误解甚至盲区；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上，依然存在如何落实、具体路径等问题。为此，既需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也需要在理论上小心论证。而后者，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乃至学术出版人提供了机遇，

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秉承学术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的宗旨，辛勤耕耘，努力进取，时刻关注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研究，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个历史节点，从党的方针政策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都发出了自己应有的声音，切实起到了党和国家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国“历史三峡”的重要时刻，中国社会科学院尤其要发挥自身理论优势，为改革释疑解惑、谋划布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书系选取了16个专题，约请国内该领域重要学者主持撰写，形成系列丛书。我们的设想是：

1. 所有专题都必须是当前深化改革实践中的难点问题、重点问题和关键问题。

2. 所有写作者必须是对这些问题深有研究的学者。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卓有建树，是某些重要理论观点甚至学派的创始人或者代表，还长期关注社会实践，参与党和国家某些重要政策的制定或论证。

3. 各专题的写作者对十八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讲话的渊源以及理论与实践基础有深刻研究、深透认识。

4. 书系总体为应用对策研究，要求有观点、有论证、有调研、有数据、有方案，实证性突出。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选取的 16 个专题是：改革开放与中国经验、经济体制改革、财政制度、企业绩效革新、人口问题、城镇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依宪治国、文化市场、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这些专题覆盖了十八大报告所论及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七大方面中，除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外的五个主要方面，都属于改革中的关键点。各专题的写作者多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部分来自中央编译局、清华大学等国内重要研究机构与高校，全部是各该领域的顶尖级学者。这些学者已有的学术积淀，以及他们长期为党和国家政策制定担当智识支持的经历，保证了书系的权威性、实用性和指导性。从各专题的成稿情况看，作者问题意识强，对当前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反映多，理论探讨深入。书中提出的对策方案，也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总体而言，书系内容扎实，讨论深入，对现实有参考意义，基本达到了我们的要求。当然，学无际涯，改革无止境，诚挚欢迎学界同道讨论批评。

书稿初成之际，得知书系入选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不胜欣喜，也很受鼓舞。2014 年是中国的马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正当扬鞭奋蹄，开启新程。

是为序。

王伟光

2014 年 2 月 5 日

摘 要

以 2010 年之后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为标志，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劳动力供给日益趋紧，投资回报率加速降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空间大幅度缩小，其直接的表现就是 GDP 潜在增长率的降低。2012 年和 2013 年实际 GDP 增长率都是 7.7%，这个大幅度的下滑并不是外部冲击所致，而是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决定的。201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使用了“潜在增长率”这个概念，要求经济增长速度与之相适应。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有两条途径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一是进一步清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二是从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上来。而这两条途径的开启都有赖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向各个相关群体说明改革并不会“抑制增长”，而是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可以立竿见影提高潜在增长率，将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从而依靠全方位的积极性来推进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

2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思路。这种以顶层设计、全面配套方式推进的改革，要求从改变政府职能入手，从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到创造有利于竞争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承担更多的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的转变。以此为基础，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环境，既可以及时赢得改革红利，又可以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动力，从而使中国经济长期尽享改革红利，保持可持续增长源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转变。

Abstract

Using changes in the working age population, i. e. , those between 15 and 59 , as a benchmark, its negative growth in China since 2010 indicates that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s the country has been enjoying for years have begun to dissipate. Specific symptoms of this trend include the tightening up of labor supply, slowing growth rates for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shrinking space for further resource reallocation for purpose of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ll of which being ultimately reflected in reduced potential rates of GDP growth. The actual GDP growth rates for 2012 and 2013 were 7.8 % and 7.7% , respectively. These numbers represent a considerable drop from what had been the norm for the previous 30 years or so. This was not due to external factors, but rather to a decline in China's potential growth rate.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notion of “potential growth rate” in the government's official documents was in the 2013 *Government Work Report*, which specifically demanded that it be matched by the real GDP growth rate.

There are two possible ways to increase the potential growth rat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sappearing demographic dividends: one is by eliminat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the supply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he other is to shift from an economic model in

which growth is driven primarily by investment to one in which growth is driven by improvement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oth strategies require for their implementation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reform. Reform does not mean suppressing growth, but rather promises to bring solid and substantial reform dividends and swift increases in potential growth rates. Explaining this to relevant parties, from both a theoretical and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will help strengthen people's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and commitment to reform, both of which being key to motivating the entire society to continue to push reform forward.

The government put forward at the 3rd plenum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general plan for deepening reform from a new starting point. Promoting reform in this way, that is, through top-down design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demands the government to change its functions, i. e. , to shift from direct involvement in economic activities to creating a macroeconomic policy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competition, and to take on more responsibilities for social governance and provid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se changes would be the basis for creating a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market's potential as a decisive forc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can be realized to the fullest. Together, changes in government function and in the role of the market will yield reform dividends, forge a new driver for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reform,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and help the country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China,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is poised to accomplish the monumental feat of transitioning smoothly from being a middle-income to being a high-income country.

引言

以 2010 年之后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为标志，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其直接的表现就是 GDP 潜在增长率的降低。2012 年和 2013 年实际增长率都是 7.7%，这个大幅度的下滑并不是外部冲击所致，而是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决定的。根据已有的研究，模型估计的潜在增长率，2012 年为 7.89%，2013 年为 7.48%，与实际增长率非常吻合。^① 换句话说，之所以中央政府能够接受这个低于 8% 的增长速度，在于认识到了“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并在 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给予明确表述。事实上，自 2012 年开始，中央政府不仅把增长速度预期定在 8% 以下，而且也真正能够接受这个增长速度。

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日益趋紧、投资回报率加速降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空间也大幅度缩小，因而，潜在增长率将逐年有所下降（见图 1）。这提出一系列

① 陆旸、蔡昉：《调整人口政策对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劳动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 期。

严肃的认识问题，例如，如果说在“十二五”期间还能够维持平均7.55%的话，“十三五”期间平均则进一步下降到6.20%。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尽管我们能够接受今天的7%~8%的实际增长率，但能否接受不久之后可能面临的6%~7%的实际增长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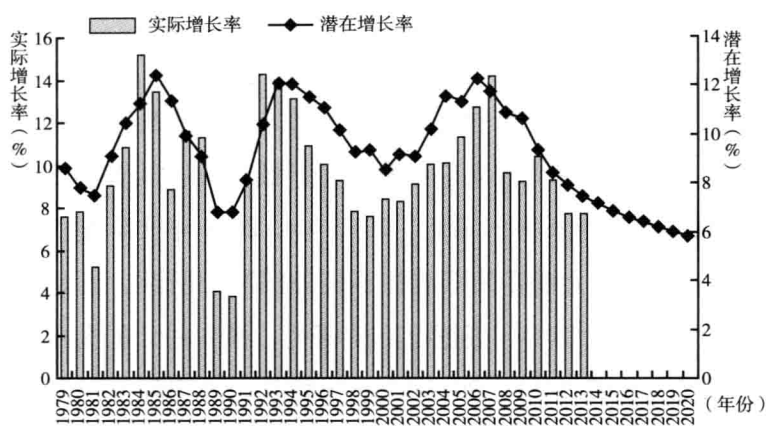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测

资料来源：根据陆畅、蔡昉《调整人口政策对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载于《劳动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绘制。

实际上，在过去GDP增长速度低于8%的两年中，宏观经济政策已经感受到较大的压力。中央政府感受到的是“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则尝试采取局部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企业面对市场疲软和成本上升等困难而嗷嗷待哺，经济学家也纷纷从需求角度建议新的经济增长点。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但是，通过制度改革获得改革红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一回事，试图通过需求方的刺激手段拉高增长速度则是另一回事，超越潜在增长率是危险的。根据国际经验

和教训，特别是日本从泡沫经济破灭至今“失去的二十年”的教训，以及中国经济中已经显现出现象，我们已知的经济增长超越增长能力的危险，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十分突出。

第一，从僵尸企业到僵尸金融。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提高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企业利润空间急剧缩小。这时，刺激政策则意味着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支付各种补贴，维持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苟延残喘。一旦企业过度依赖刺激政策，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就失灵了，企业不能正常退出，最终那些没有竞争力而继续生存的企业便成为僵尸企业。由于刺激政策是依托国有银行甚至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的，信贷也过度偏重在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建设项目上，金融风险过于集中，僵尸企业产生也必然把金融拖到危险的境地。

第二，从产能过剩到基础设施过剩。企业和产业在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形成的生产能力也必然是过剩产能。事实上，过去几年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甚至区域政策，都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政策制定者也认识到，在实体经济比较优势下降，从而投资积极性不足的情况下，刺激政策的效果往往导致产能过剩，因此，许多刺激政策着眼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一种派生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与实体经济需求密切相关的。曾经担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宫崎勇发现，在日本面临增长减速、尝试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过程中，公共投资遇到先是“有预算没下拨”，继而“下拨了没到位”，及至“资金到位没开工”等层层打

折扣的问题。^① 既然没有实际需求，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刺激政策也只能造成产能过剩。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显示，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基础设施过剩上面。

第三，从流动性溢出到泡沫经济形成。宫崎勇终究没有弄明白，本应投向基础设施的资金究竟去了哪里。其实，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终究造成过大的流动性，在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不强的情况下，放出笼子的货币终究要寻找其出处，自然且必然的选择便是流向各种理财领域。对此，凯恩斯的批评者早在 1933 年就有了先见之明。针对凯恩斯的刺激政策建议，斯基德尔斯基在“经济信息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同事休伯特·韩德森给他写信说：“如果你宣布启动一项 2 亿英镑的宏大计划，你将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拿不到一个订单（因为需求不足——引者注），同时，它对金边股票之类的市场会产生迅速的影响。这样，你也许会在良性循环开始启动之前已经被恶性循环所围绕而不能自拔。”^② 而一旦形成泡沫经济，破灭也就是或迟或早的事情了。

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的上述危险，已经反复被那些遭遇经济增长减速的国际教训所揭示和印证，但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并不广为人知，或者至少是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警醒。因此，不厌其烦地予以阐述和提醒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同等重要的危险也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上。本书便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揭示超越经济增长能力的实际增长率，也会通过劳动

① 宫崎勇：《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中信出版社，2009。

②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力市场伤害长期增长可持续性。

当我们说到人口红利时，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单纯的人口因素可以决定经济增长源泉和走向。换句话说，本书作者并不是唯人口因素论者。公正地说，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只要能够充分把握和全面理解从而综合运用各主要增长理论，无疑就应该懂得，有利的人口因素可以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资本回报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基本增长源泉，创造出所谓的人口红利。因此，当人口的变化趋势不再构成这种有利的因素时，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事实上，笔者及与合作者此前做出的关于潜在增长率的估计^①，以及后来所做的局部修正^②与 2012 年和 2013 年实际增长率的走势高度吻合。而且，这个预测的准确性，与长期以来笔者所热衷于宣传的关于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的到来，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在经验上也就必然是相关联的。

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在争论孰是孰非，标榜自己的一贯正确，而是希望经济学家尽快达成这样的共识，即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增长减速，不是短期的需求方扰动因素所致，而是长期的供给方因素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所致。惨痛的国际教训表明，这个共识的达成虽然难度很大却异常重要。凡是那些用需求刺激手段代替提高潜在增长率努力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把减速变成

① Cai Fang and Lu Yang, Population Change and Resulting Slowdown in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1. No. 2, 2013, pp. 1 – 14.

② 陆旸、蔡昉：《调整人口政策对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劳动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 期。

了灾难性的停滞。日本就是一个经典的反面教材，“安倍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则意味着日本的决策者尚未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本书对这个问题的宏观经济和增长视角进行了扩展，引申到刺激性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不良影响，即伤害人力资本积累激励，加速比较优势丧失，削弱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经济体制改革日程开始实施，解决问题的出路已经越来越明朗，即把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毋庸置疑，把中国经济学家的认识统一在这个思路上面，对于今后二十年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萧伯纳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思维，他们最终什么也改变不了。关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面临的挑战，传统观念流行甚广，误解与误读也大行其道。本书尝试采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去、现在和将来纳入其中，给出逻辑严密和一以贯之的解说，并援引经验证据加以验证，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虽不敢称正确，但是希望对读者和经济学界同行有所启发，得以对一些流行的观点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章 人口红利	1
一 经济增长的人口引擎	2
二 刘易斯模型的应用	8
三 农业剩余劳动力	14
四 劳动力流动	23
五 中国的人口转变	27
六 分解中国经济增长	32
七 结语	36
第二章 刘易斯转折点	39
一 从“民工荒”到劳动力短缺	40
二 劳动力需求模式变化	43
三 工资上涨与工资趋同	52
四 人口红利消失	58
五 延续人口红利	65
六 储蓄率的可持续性	79
七 结语	85